

· 医学史 ·

关于藏医学挂图(曼唐)第 80 幅出处问题的探讨

甄 艳 蔡景峰

摘要 藏医学系列挂图(藏名“曼唐”, *Sman thang*)是藏族人民在公元 17 世纪编绘创造的一套医学教学工具,也是难得的文物、艺术珍品。全套共 79 幅,是五世达赖喇嘛时期(1617—1682 年),由其摄政王第司桑杰嘉措所主持编绘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1876—1933 年)在复制这一套曼唐时,增加为 80 幅。20 世纪末,著名藏医学家强巴赤列撰文提出,在罗布林卡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所收藏的此第 80 幅挂图是第司本人所主持绘制的,因为在此幅挂图的背面有第司本人所题诗句 14 偈,并加盖了他个人印章为证。然而,迄今世界上包括中国国内所出版的所有这套画册(其中就有西藏文管会所主编的一套),凡有第 80 幅者,均未能证实其为第司本人之作。此悬案仍有待深入探索。

关键词 五世达赖;十三世达赖;第司桑杰嘉措;藏医学系列挂图(曼唐);第 80 幅

Exploration on the Source of the Eightieth Painting in the Tibetan Medical Painting Set ZHEN Yan and CAI Jing-feng Department of Minority Medicine, China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ABSTRACT The Tibetan Medical Painting (*Sman thang*) is a set of medical teaching tool created and drawn by the Tibetan people in the 17th century AD, which is also a rare cultural relic and art treasure. A total of 79 paintings were created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5th Dalai Lama (1617 -1682) and were inaugurated, designed and sponsored by his regent (Sde srid), Sangye Gyatso (*Sangs rgyas rgya mtsho*).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13th Dalai Lama (1876 -1933), this Set of Tibetan Medical Painting was increased to 80 plates when copied.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Jampa Trinley (*Byams pa 'phrin las*), a famous Tibetan scholar of Tibetan medicine wrote that the 80th painting collected by the Tibetan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Committee at Norbulingka was created by Sangye Gyatso himself, evidenced by his 14 slokas of Tibetan verses and his personal seal at the back of this plate. However, the 80th painting in all Set of Tibetan Medical Painting published in China so far, including the one by Tibetan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Committee itself, all failed to prove that it was indeed created by Sde srid himself. This pending case still nee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WORDS the Fifth Dalai lama;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Sde srid Sangye Gyatso; tibetan medical painting set (*Sman thang*); the eightieth painting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千百年来,藏族民族以其聪明才智创造了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特色的藏族文化,一般称为“五明学”(*Rig pa Inga*),包括因明(逻辑学、哲学),内明(佛学),工巧明(工艺、技术、

历算),医方明(医学),声明(语言、文字学)。藏医学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藏文为 *Gso ba rig pa*。其中的工巧明,藏文为 *'phrul las rig pa*,就包括绘画艺术在内,这种绘画艺术的集中表现之一就是创造了“唐卡”(*Thang kha*),也就是卷轴画。卷轴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用来表现医药和保健事项,称为“曼唐”(*Sman thang*),即医药学挂图的意思。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No. 11WZS004);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No. ZZ070506, No. ZZ110509)

作者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民族医学研究室(北京 100700)

通讯作者:甄 艳, Tel: 010-64089116, E-mail: 158136474@qq.com

DOI: 10. 7661/j. cjim. 20180612. 056

曼唐的绘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起初,主要是一些医学家用它来表达藏草药和身体结构的零星图画。到了清代初期,藏族地区是由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统治的时期。五世达赖本人对医学就很感兴

趣,曾大力发展医学。他的摄政王(藏语称为“第司”,*Sde srid*)桑杰嘉措(*Sangs rgyas rgya mtsho*)更是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不遗余力,他不但对藏医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Rgyud bzhi*)做了最权威的注疏和发挥,撰著了一部单独的注疏本《四部医典·蓝琉璃》(*Baidurya sngon po*),还著有一部最详尽的藏医学历史著作《藏医史》(*Gso rig sman gyi khog' bugs*)。他还召集了全藏的绘画艺术家,根据《四部医典·蓝琉璃》的内容,主持设计并编绘了一整套完整的医药系列挂图,成为一套集大成的“曼唐”,即医药系列挂图共 79 幅,每幅挂图下面的说明,全都明确指出该幅图是用来表达和说明《四部医典·蓝琉璃》某章某节的哪些内容的。西方藏学界大多称它为“藏医学画图”(*Tibetan Medical Paintings*)。

根据桑杰嘉措自己的《藏医史》的记载,他编绘的这一套“曼唐”共计是 79 幅,制成于 1703 年。这样一套美轮美奂的医药图画不仅是艺术上的珍品,也是记录藏族人民的医药生活和活动、传播医药知识的作品,更是表达此时藏族的政权甘丹颇章(*Dga' ldan pho brang*)无上权威的艺术品。它既有深邃的科学价值,也是一套历史文物;既是直观的教学工具,又是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在世界上也是仅见和宝贵的文化遗产。

既然桑杰嘉措已经明言全套“曼唐”为 79 幅,为什么后世有第 80 幅呢?原来,在五世达赖之后,藏区的政治形势比较混乱,“曼唐”系列濒临流散,有不少落入民间,又经民间艺术家仿制,真假难辨、谬误不少。再者,此时正是西方外国探险家、传教士纷至沓来之际,在传教之外,有些探险家也随手将这类艺术珍品携走,其中竟有全套 79 幅挂图系列落入俄国人之手,这一套挂图现仍收藏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历史博物馆里,他们还根据这一套挂图编集成“曼唐”系列挂图画册。直到 20 世纪初,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土登加措(*Ngag dbang Thub bstan rgya mtsho*)终于担负起继承和整理的重任,并 3 次(1918、1923、1933 年)重新复制了全套“曼唐”系列^[1]。有趣的是,经过整理复制的挂图,已经形成了 80 幅的系列。这第 80 幅是一幅题为“西藏名医”的挂图,即围绕五世达赖的周围,绘出历代著名藏医的系列图,其中就包括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加措。问题就出在此处,究竟这第 80 幅图是如何来的?

世界各国有不少学者对独特的藏文化,即藏学(*Tibetology*)感到十分兴趣,其中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藏医学,尤其是“曼唐”系列挂图。为了扩大影响,

各国藏医学家都争相出版“曼唐”的系列挂图画册。事实上,在上世纪中叶,俄国学者就首先对系列挂图进行了研究,当时主要是研究其中的藏草药,并将其编入《藏医中应用的药用植物之藏-拉-俄名词词典》(*Dictionary of Tibetan-Latin-Russian Terms for Medicinal Plants Used in Tibetan Medicine*)^[2]。20 世纪 40 年代,俄国人已经开始把这些挂图加以收集,并于 1949 年编集成册,惟尚未正式出版。最早的图册出版物还是我国在 1986、1988 年分别出版的两部画册^[3,4]。此后,各国学者争相出版这种图册,比较有名的早期画册有英国伦敦版(1992 年,两卷本)、俄文版(1994 年)、德文版(1996 年)、意大利文版(2000 年)、日文版(2016 年)等。英文版的画册还不止一种。

无论何种版本,包括国内的、国外的,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本自桑杰嘉措的原作。然而,桑杰嘉措的原作到了 18 世纪以后,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因此,除了极个别的图幅以外,后世所见,均为根据原画辗转描绘复制而成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复制的全套系列图谱而保存下来的,国内所有的画册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一套而编成的。而国外的画册,则是直接或间接根据此前保存在俄国布里亚特共和国历史博物馆的一套编纂而成的。两种画册最大的不同是国内的版本都收入了第 80 幅图,而国外的(以伦敦的英文版和莫斯科的俄文版为准)则无这第 80 幅图,而只有 79 幅。

原本这种情况并不存有疑问,然而,1996 年,原西藏藏医院院长、著名藏医学专家强巴赤列(*Byams pa' phrin las*,他也是那两部在国内最早出版的画册的作者之一)在他的一本新著中,却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5]:“本人于 1976 年亲眼见到了由罗布林卡文管会所收藏的唐卡挂图 80 幅,特别是在主尊唐卡挂图的背面书写了由第司·桑杰嘉措亲自编写的诗文 14 偈,并加盖第司本人的印章。有了上述这一证据,无需任何旁证,故后来者不必对其真伪表示怀疑。”

这段叙述令人十分不解。犹记得在 1976 年,本文作者之一的蔡景峰和强巴赤列亲自参加这 80 幅唐卡的审阅工作,直至 10 年以后出版的两部唐卡画册,强巴赤列作为作者之一,均未对这第 80 幅唐卡提出如上的见解,当时见到的挂图也包括收藏在罗布林卡的那些挂图。问题就在于此,1996 年出版的强巴院长的新著中,他提及在 1976 年见到了这幅挂图的背面有桑杰嘉措的诗文 14 偈和个人印鉴,而在 1986、1988 年两部画册出版时却都未提出这个问题。在当时所检

视的所有唐卡中,经研究小组鉴定,保存在门孜康的 130 幅挂图中,只有一幅是五世达赖时期的产物^[1]。可惜当时的研究小组并未指出这唯一的一幅就是那第 80 幅“医药师尊图”;而按照两部拉萨出版的画册中的第 80 幅图,均绘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加措的画像,那显然不可能是五世达赖时期的作品,而应当是十三世达赖时期的画作无疑。

对于强巴院长的新见解,存有一些疑惑。首先,他在两部画册出版时,都未提出这一见解,令人不解;其次,桑杰嘉措本人在《藏医史》(1703 年)这部著作里,只提出他们共编绘 79 幅唐卡,而未提到有第 80 幅师尊图之作。果真是桑杰嘉措本人主持绘制了此幅挂图的话,则应当是 1703 年之后的事,也即是 1704 年。由于当时的时局十分紧张,以至于他自己在次年(1705 年)遇刺身亡,在这一紧张的形势下,他是否还有此精力和时间来亲自顾及此事,也当存疑。最后,在所有出版的画册中,从未见到仅单独以五世达赖为主尊的第 80 幅图,而都是带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图像的“西藏名医图”。

然而,也不能十分武断地否定强巴院长的这一新见解,因为他提到的那幅图是在罗布林卡的一幅,而我们却仍然未能认真地检视罗布林卡的这一幅图。于是,又认真地阅读了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于 1985 年编辑出版的一部唐卡画册。该书共收集唐卡 140 幅。其中,标明为“医药师承像”的是第 129 图,绘有“自公元八世纪宇妥·云丹贡布以来至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医药大师师承。中间是药师佛像,两旁和上端共画了医药传承三十余人”^[7]。其构图与第 80 幅曼唐不尽相同,且在这幅挂图的汉、藏两种文字说明中,均未提到其背面有桑杰嘉措的诗文及印章这样的内容。我们又检视了在中国出版的另外一部大型唐卡挂图集《西藏唐卡大全》^[8],这部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编集的画册,共收入西藏唐卡 346 幅,其中编号第 262~341 共 80 幅唐卡,就是系列挂图那 80 幅。其中编号为 341 的那一幅,也就是拉萨早期出版的那两部画册中的第 80 幅。同样可惜的是,在此图的说明中也未提及有桑杰嘉措诗偈及印鉴的内容,只是说此图现保存于西藏藏医院;此画册另有一幅编号为 173 的挂图,虽题为“藏医师承图”,但对此图的说明文字只写道:“本唐卡是药王佛及新老宇妥·云丹衮波法像”,毫不涉及桑杰嘉措,也无任何达赖喇嘛的法像在画中,更无强巴院长提出的那些证据的任何线索。

2006 年强巴院长与其徒弟次旦久美(*Tshe brtan 'jig med*)出版了一部大型的曼唐画册,书名为

《藏医四部医典八十幅曼唐释难·蓝琉璃之光》(*Gso rig rgyud bzh'i sman thang brgyad cu'i dka'grel Baidurya'i'od snang zhes bya ba zhugs so*),全书共计 1 161 页,其中也载有第 80 幅“西藏名医”图^[9]。遗憾的是,在这部大型的唐卡画册里的第 80 幅图,却仍然是过去几部画册刊登的那一幅,即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复制的那一幅,且注明此图是收藏于藏医院,而不是罗布林卡的那一幅。在对这幅曼唐的解释中,对桑杰嘉措的 14 偈诗文及其印鉴之事也只字未提,很可惜,失去了对这一幅图是否为桑杰嘉措所亲自主持绘出的这一事实进行澄清的最好机会。

如上所述,几乎所有在西方出版的曼唐画册里原本并不存在这第 80 幅的问题,因为在布里亚特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唐卡系列总数只有 79 幅。但这也有个别例外。例如,一部书名叫《肉体和精神:藏医画册》的书,除了刊载 79 幅挂图以外,也有一幅类似的这类医药师承图^[10]。但它并不是作为全画册的第 80 幅来处理,而是放在全书的卷首,作为一幅特殊的曼唐来处理的。奇特的是,这一幅主尊图的正中央正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画像!十分可惜的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这一幅医药师承图并未指出其来源。尽管本幅图与曼唐系列的其他诸图并不全相同,但作者把它放在一部题为“藏医学画册”里,且其风格基本上和其他 79 幅的系列挂图是一致的,也极容易被读者误认为是系列中的一幅,产生误解。

其实,自从曼唐系列挂图问世以来,世界各地仿绘的唐卡已不计其数。正如澳大利亚的著名波斯语系学家兼藏学家埃默瑞克(Ronald E. Emmerick)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有一些藏族绘画技术的造诣,就可以轻易地仿制这种曼唐了^[11]。例如,在台北出版的那部唐卡画册中,其第 80 幅主尊图正中间的画像,竟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2]!这就可以佐证埃氏所言不诬。

正如强巴院长所指出的那样,他看到的那幅有桑杰嘉措诗偈和印章的第 80 幅挂图是在罗布林卡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的。由此,有理由怀疑,是否在罗布林卡真有一幅桑杰嘉措时期绘制的第 80 幅主尊图,而它却至今未能在国内、外任何唐卡画册里出现,甚至于文管会自己出版的《西藏唐卡》这部画册中也未能收载。鉴于迄今国内所出版的三部大型唐卡画册中的这一幅图,都是保存于拉萨门孜康(*Sman rtsi khang*,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因此,只有等待将来有机会亲自检视罗布林卡保存的这一幅图(如果罗布林卡真有这么一幅图的话),才有可能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参 考 文 献

- [1] 蔡景峰,赵璞珊. 藏医彩色挂图的初步介绍[J]. 江苏中医杂志, 1980, (3): 48.
- [2] Bolsokhoeva ND, Gerasimova KM. The Atlas of Tibetan Medicine [A]. Avedon JF, Meyer F, Bolsokhoeva ND. et al (eds). The Buddha's Art of Healing: Tibetan Paintings Rediscovered [M]. New York: Rizzoli, 1998: 60, N. 24.
- [3] 强巴赤列, 王镭. 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 [4] Qyams pa 'phrin las, Cai Jingfeng. Tibetan Medical Thangkhas of the Four Medical Tantras [M]. Lhas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f Tibet, 1988.
- [5] 强巴赤列. 中国的藏医(汉文版)[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48.
- [6]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西藏唐卡[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图 129.
- [7]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西藏唐卡[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129, 193.
- [8] 西藏唐卡大全[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0: 113, 222.
- [9] 强巴赤列, 次旦久美. 藏医四部医典八十幅曼唐释难·蓝琉璃之光(藏文版)[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1144-1161.
- [10] Laila W, Serinity Y. Body & Spirit: Tibetan Medical Paintings [M]. New York: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association with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frontispiece.
- [11] Emmerick RE. Some Tibetan Medical Tankas [J]. Bulletin of Tibetology, 1993, 29(1): 56-78.
- [12] 黄英峰. 西藏医学艺术[M]. 台北: 普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 278-279.

(收稿: 2018-01-17 在线: 2018-07-12)

责任编辑: 白霞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办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交流会在 2018 年 6 月 21—23 日在北京隆重召开, 来自国内中西医学界 300 余家医院、近 1 000 名消化领域专家参会。

会前成立了 16 个专家委员会, 分别为: 食管早癌、胃早癌、大肠早癌、胃食管反流病、静脉曲张消化道出血、非静脉曲张消化道出血、超声内镜、胶囊内镜、内镜质控、肠道微生态、小肠镜、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炎症性肠病、消化心身、消化病理、幽门螺旋杆菌专家委员会, 每个专家委员会还进行了各自的专题学术交流。

本次学术交流围绕中西医结合消化内镜学领域的临床、基础和转化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内容涵盖食管、胃肠、肝胆胰腺疾病临床与科研研究、内镜质控等。主会场设置了院士论坛、主委论坛及名家论坛。院士论坛中, 陈香美教授提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学专业委员会应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亚专业, 以全新的面貌实现中西医相结合, 其在组织管理力上要力求中西医相互合作、结合以及整合, 将医学事业推向一个高峰。樊代明院士从“医学的反向研究”入题, 强调中西医整合是个必然的过程。中西医结合可以更好解决现代医学专业过度细化、专科过度细化、医学知识碎片化的问题。作为当代医生, 不仅要掌握当代的医学技术, 还要掌握中国特色的中医药技术, 这样才能更全面的解决消化系统的疾病。主委论坛中令狐恩强教授从内镜手术的新时代角度, 提出不切除器官, 仅祛除病变, 从而保持人体解剖结构完整性的“超级微创”手术理念。此和中医的整体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魏玮教授则对中西医结合消化内镜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定位, 未来学会将通过各专家委员会的建立以及融合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 进行相关规范化培训以及理论、思路、方法和药品的创新, 开放临床及科研工作的学术交流与人才交流。实践中国消化病学“中国医学”新理念, 以消化内镜为轴, 对消化系统疾病进行 360°无死角防治, 引领中西医结合消化内镜学的发展。

会议根据专业方向的不同设置了分会场, 邀请国内外著名的中西医领域专家进行了相关专题的讲座, 并进行了会议投稿优秀论文的汇报, 不同程度的体现了中西医结合消化内镜学的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本次会议特别设置青年委员视频大赛, 由国内知名内镜专家作为评委, 比赛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操作视频作品, 受到了众多专家的一致好评。

参会的中西医专家对此次会议的形式、中西医对话的意义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通过此次学术交流会, 学员都有所收获。此次会议起到了桥梁作用, 为中医、西医相互认识搭建了平台, 真正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对话。

(王欣 孟曼 吴诚整理)